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董海樱

内容提要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关键词 汉学 中国学 理论范式

西方的汉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始自19世纪初的法国,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中国学者理应重视。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一些国内学人开始关注域外学者关于汉学的研究及其成果。^①不过,中国学界对这一研究的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较为沉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所改观。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日益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中国也加强了对这些研究的反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在国内一直持续升温,进入21世纪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探索、专题研究乃至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如下特点。第一,对这一学科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第二,高度重视对原始文献资料的译介和解读;第三,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研究领域,积极开拓新的研究方向;第四,跨学科、多学科联合得到加强;第五,中外学术交流与互动在更高层次频繁展开。

本文将根据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有关西方汉学(中国学)译著以及相关研究的专著和论文的情况,分三个专题对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进行评述,以理清其学术发展的脉络,探讨存在的问题,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是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Y201016851。

①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一、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理论体系探讨

众所周知,西方的汉学研究以1814年12月11日巴黎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创设“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 - Mandchoues) 雷缪萨(Jean - Pierre Abel - Rémusat, 1788—1832年)出任该讲座第一任教授并于1815年1月16日第一次授课为标志,进入专业化或学院化阶段。^①此后,荷兰的莱顿大学于1875年首开汉学讲座;英国牛津大学于1875年开设汉学教程,剑桥大学在1888年设立汉文教授职位;德国柏林大学于1887年建立东方语言学院,1909年汉堡大学也正式开设汉学讲座。然而,在19世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这门学科。直到1882年,《牛津辞典》第一次收录了由希腊语和拉丁文合成的单词“Sinology”,并把它定义为“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②(the Study of Things Chinese)。这样,汉学研究在西方学界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才有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其地位也日益凸显。

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汉学研究基本继承法国的治学传统,即崇尚中国古代历史和文献典籍的研究,侧重对中国语言文化等人文学科进行纯学术的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开始脱离传统的研究框架,逐渐转向关注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确立起所谓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其奠基人为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年)。费正清在其治学生涯中一直力主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融入到中国历史文化乃至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当中,从而大大拓展了汉学研究的内容,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并由此使得汉学研究这门学科开始发生重大变化。^③如果说此前“Sinology”在欧洲大学学科设置中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的话,那么“Chinese Studies”在美国则被视为一种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而有关中国研究的各个主题被分解到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学科领域。

“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立,不仅使得西方学界对这门学科的名称和学科定位出现分歧,也造成中国学者在将西方的中国研究视为一门学科进行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思考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2000年以来,中国学者围绕着西方的汉学(中国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概念、属性以及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重点研究,现列举各主要观点如下。

1. 西方汉学(中国学)学科概念

由于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发展历程上存在着“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这两种形态,那么如何在汉语语境中给这一学科命名就成为一个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继愈就提出:采用“汉学”这个名称,纯属习惯问题,是否恰当,可不必深论。^④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仍无法统一意见,主要有三种观点。

① 董海樱《雷缪萨与法国汉学》,《法国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傅海波《探寻中国:欧洲汉学史概述》(Herbert Franke,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明·威尔逊和约翰·凯利合编《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史国际会议论文集》(Ming Wilson &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伦敦1995年版,第12页。

③ 陶文钊《费正清与中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41—161页。

④ 任继愈《汉学研究在中国》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页。

第一种称之为“汉学”,即将“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都译为“汉学”。有些学者在“汉学”前面还加上一些定语,比如“国际汉学”、“世界汉学”、“西方汉学”、“海外汉学”等,以区别于中国学术史上与“番学”和“宋学”相对的“汉学”。据日本学者高田时雄(Takata Tokio)的研究,中国学界将“Sinology”译为“汉学”极有可能始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①当前,“汉学”概念使用较为广泛,但凡涉及这一学术研究的机构、课程、刊物和相关的学术会议,通常采用“汉学”一说。比如现今比较有影响的汉学刊物有《世界汉学》、《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上面刊登的文章明显偏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第二种称之为“中国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孙越生等学者就对“汉学”概念提出异议,呼吁用“中国学”来替换“汉学”。^②他们的观点也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比如何培忠在深入分析和研究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由于“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的研究对象已在相互接近和兼容,使用“中国学”的称谓比“汉学”显得更广泛,更具兼容性。^③朱玉粟则从学科性质与发展趋势的角度,提出“中国学”可能是这门学科在发展中的合理选择。^④

第三种称之为“汉学(中国学)”或“中国学(汉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特别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将“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区别开来。比如侯且岸指出:西方(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经历了从汉学到中国学(或者是“现代中国学”)的学术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不断扩大,从传统的人文研究到形成以地区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学科的相互组合与渗透,其所遵循的研究范式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⑤严绍盪则提出对“Sinology”所表述的意思应该有一个历史时间的区分,把英法德美日等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在各国的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开展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他还把“Chinese Studies”视为另一类的研究,即“现代中国的研究”^⑥。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笔者以为对西方的中国研究这一学科的命名,既要充分考虑中国学术界的传统,又要将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和以实用为原则的对中国现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区别开来。因此,笔者比较倾向于采用“西方汉学(中国学)”这一概念,它在沿袭国内学界传统的同时,又显示了对各学派的尊重。

2. 西方汉学(中国学)学科属性和定位

西方汉学(中国学)在西方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内学界对这门学科如何做出准确的学科定位,正确认识其性质,以厘清西方汉学(中国学)与国学^⑦的关系,有着特殊的意义。

曾经一度有学者不论研究者的国籍,将西方汉学(中国学)概念进行广义化。例如林徐典提出:“汉学是以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学问。”^⑧这无形中

① 何培忠《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学科的称谓》,《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5期,第67页。

② 孙越生、李明德主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何培忠《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学科的称谓》,《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5期,第68页。

④ 朱玉粟《基于学科性质的讨论:汉学与中国学辨名》,《安徽史学》2008年第3期,第122页。

⑤ 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国际汉学》2004年第10辑。

⑥ 严绍盪《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2000年第5辑,第8页。

⑦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关于“国学”的概念,迄今国内学界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说,国学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学术。

⑧ 林徐典《欢迎词》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页。

把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的研究都视为汉学(中国学),从而混淆了西方汉学(中国学)与国学这两个概念,模糊了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学科性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前学界对西方汉学(中国学)学科性质及其定位的认识逐渐明晰。

严绍璁在综合考察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主体的特殊性之后,提出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但是,作为从事这样的学术研究者,却又是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来说又是他们“母体文化”观念,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因此,国际中国学(汉学)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钱婉约的观点与严绍璁比较接近,她也指出西方汉学(中国学)“是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和多边文化关系的边缘性学科,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它属于比较文化的性质”^②。

阎纯德则认为“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范畴”^③。张西平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主张“海外汉学(中国学)虽然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从西方汉学(中国学)来看,它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④。

从上可知,尽管各位学者在具体文字表述上不尽相同,但已形成一个基本认识,即西方汉学(中国学)是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一个分支,具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特性。西方汉学(中国学)与国学既有同也有异,相同之处表现在内容上都以中国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差异则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文化语境、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具体研究成果时,要特别注意其学术背景、方法论和问题意识。

3. 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范畴

西方汉学(中国学)从19世纪初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种综合性、多层面和跨学科的研究。

为此,严绍璁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范畴做了四点概括: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第二,关于中国文化传入对象国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第三,探讨世界各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第四,研究中国文化各个领域中国学者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⑤严绍璁的“四点论”得到不少国内学者的认同。

李学勤则具体提出了研究西方汉学(中国学)所应关注的六大问题。即“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汉学

① 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2000年第5辑,第11页。

②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5页。

③ 阎纯德《汉学和汉学研究》,张西平编《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④ 张西平《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研究》,《中华读书报》2005年3月30日。

⑤ 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2000年第5辑,第12—15页。

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进展的趋势”。^①

概括起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立足于西方的各种类型的原始文献资料或著述,研究历史上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各个学科领域的认识及其研究成果,探寻西方汉学(中国学)发展的轨迹,即对西方汉学(中国学)学术史的研究;第二,研究历史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中国观”,换言之,即探寻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传播的轨迹及其影响;第三,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探寻西方汉学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者交往和互动的历史,以及对中国学术演变所产生的影响,等等。

4. 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方法

如上所述,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是一种综合性、多层面和跨学科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层面来说也必然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综合当前国内学界各家的观点,我们认为:首先,要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在历史上,西方各国的中国研究都与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传统和思想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形成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西方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学勤在论及研究西方汉学(中国学)的方法时就指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②其次,要从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研究汉学(中国学)。再次,在具体研究西方汉学(中国学)有关中国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时,则要采用与之对应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比如,中国史家在关注和研究西方同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需要运用相关的史学理论和方法。

二、近十年国内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

近十年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界推出的各类西方汉学(中国学)译著和专著两百多部。被各系列丛书收录其中的有: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包括“海外学子系列”和“女性系列”)约87部;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约5部;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包括“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和“海外汉学研究”三个系列)约26部;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约9部;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汉学论丛”约34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目录丛刊”约30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约4部,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有关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论文或译文刊登在《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刊物上。

综观这十年刊行的论著,可以看到当前国内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正以各自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分别在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比较文化学等领域展开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译介和研

^① 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张西平编《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上,第11—13页。

^② 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究。归纳起来,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汉学(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二是分不同的专题和学科对西方汉学(中国学)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成果进行翻译、介绍、探讨和反思;三是关于中国典籍在西方流传、译介与馆藏情况的研究;四是探讨西方汉学(中国学)与中国学术演变的关系。

1. 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学术发展史的研究

近十年,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中国学)学术发展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尤其涉及早期西方汉学史和国别汉学(中国学)史的研究成果显著,出版或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以下按地区、国家和专题举例。

在西方汉学(中国学)史的研究中,通史性质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国内最早的一部汉学通史专著是莫东寅在1949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虽然有抄撮代著述之嫌,但自刊行至今仍广为学界同仁引用,2006年大象出版社将该书再版。^①近年,吴孟雪、曾丽雅合著的《明代欧洲汉学史》^②以及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③这两部专著,着重探讨了西方早期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何寅、许光华编著的《国外汉学史》^④,黄长著、孙越生与王祖望主编的《欧洲中国学》^⑤,以及何培忠主编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⑥,这三部论著则对西方中国研究的整体历史和现状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梳理,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关于国别汉学史的研究,除了早年张国刚关于德国汉学、侯且岸关于美国中国学、张静河关于瑞典汉学的研究之外,近年又有不少学者对特定对象国关于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如熊文华的《英国汉学史》^⑦、阎国栋的《俄罗斯汉学三百年》^⑧、李明滨的《俄罗斯汉学史》^⑨、许光华的《法国汉学史》^⑩、胡优静的《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⑪等。

此外,一些专题汉学史的研究也很值得关注。例如,关于传教士与汉学的研究有: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⑫、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⑬、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⑭等。以个人为专题的研究有:许明龙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⑮、顾钧的《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⑯等。

① 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1949年1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印行,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了影印本,2006年大象出版社再版。

② 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④ 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⑤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合编《欧洲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⑥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⑦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⑧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⑨ 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⑩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⑪ 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⑫ 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⑬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⑭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⑮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⑯ 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从上述论著的出版可知,当前国内学界已经把西方汉学(中国学)作为一个学术对象进行多层次的探讨,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题史的研究方面都有突破和发展。

2. 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对中国人文社会各个学科的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人文和社会学科各个领域,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之相适应,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也在各个学科领域展开。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着西方汉学(中国学)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等专题进行探讨。

对于西方学界的中国社会历史研究,当前国内史学家已经从介绍西方学界同行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成果,转向重点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所采用的各种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例如,周晓虹在《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一文中,系统梳理了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不同的学科路径下从事各自的中国研究所采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依次列举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的“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佩克(James Peck)的“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围绕着国家—社会关系问题所形成的各种亚范式、柯文(Paul A. Cohen, 1934—)的“中国中心论”(China-centered Approach)等,对这些理论范式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作了非常详细的剖析和研究。^①此外,对于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的“农业过密化”理论(Agricultural Involution)、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模式、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理论”(Great Divergence Theory)、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关系理论以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的著作等,国内学者如杨念群、朱政惠、王家范、刘招成等人都有过深入的探讨。^②除了美国学者,英国学者如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还有法国学者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èr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毕仰高(Lucien Bianco)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也都陆续介绍到中国,并受到国内学界同行的高度重视。胡志宏在《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一书中,则对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③

对于西方学界在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有二:一是考察早期西方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历史;二是介绍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前者在专书专人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对一些早期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等人的个案专题研究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开展。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不一一列举。后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钱林森编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和《法国汉学

①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刘招成《美国中国学:以施坚雅模式社会科学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①、王晓路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②等。

3. 关于中国典籍在西方传译与馆藏的研究

传入西方的中国典籍是早期西方学者认知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来源,是早期西方汉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关于中国典籍在西方流传、译介、馆藏的研究也为国内学者所重视。近年,一些专著如马祖毅等著的《汉籍外译史》^③、田涛主编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④等即属此类。

4. 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与中国学术演变的关系

探讨西方汉学(中国学)与中国学术演变的关系是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⑤和《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⑥这两本书对20世纪西方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

以上是近十年国内学界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在四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仅选取已刊行的部分著作进行分析,还有不少论文没有涉及,但已足见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已经在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着,且不断得到发展,并日益引起关注。

三、对未来国内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展望

目前,国内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大量西方汉学(中国学)译著和研究著作的出版外,一些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在原有的《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国际汉学集刊》、《海外中国学评论》等。国内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也日渐增多,2000年以来成立的机构主要有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人员和学术活动,成为国内开展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和骨干。

随着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内学界的确立与发展,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也频繁展开。近年比较有影响的西方汉学(中国学)国际研讨会: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浙江大学在2006年和2008年承办的两届“海外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由中国国家汉办、中国人民大学承办,分别在2007年、2009年召开的第一、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等等。

综上所述,近年国内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作为一门刚刚起步的学科,许多具体的问题还亟待研究和解决。

首先,继续加强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当前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

① 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② 王晓路主编《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③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 田涛主编《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⑤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概念、性质、研究范畴与方法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仍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加强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尤为迫切。

其次,继续推进对西方汉学(中国学)名著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在对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编写西方汉学(中国学)书目,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译介并展开专题研究。关于汉学(中国学)书目的研究,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早已出版了一部《中国书目》^①。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对这部书目作了初步译介,而后继的补充研究仍很艰巨。

再次,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从20世纪初起,中国学者就已开始关注西方学者所进行的中国研究及其成果。对于这些前辈尤其在1949年之前所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工作,我们关注得非常少。关于研究史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掌握了这门学科研究的源流,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和方向,进而展开深入的研究,否则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军在几年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现已有成果陆续问世。^②但这项基础性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有待更多的学者参与。

最后,加强学科的数字建设,建立一系列与西方汉学(中国学)及其研究相关的文献库和数据库,比如“西方汉学(中国学)文献库”、“西方汉学(中国学)论文数据库”、“西方汉学(中国学)著作数据库”、“西方汉学家(中国学家)数据库”、“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及团体数据库”、“西方汉学(中国学)期刊数据库”、“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论著数据库”,等等。当前国内关于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建设非常欠缺。在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为了加强与国外学界同行的交流,推进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科的发展,加强数字化建设迫在眉睫。^③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专业学术机构的设置、学术刊物的发行、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今后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西方研究中国,中国学者通过对西方的中国研究展开研究来反观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西方汉学(中国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学术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这么说,西方汉学(中国学)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范式和成果,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是推动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作为西学一部分的西方汉学(中国学)时,对西方的历史文化也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而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更高层次实现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互动。

[本文作者董海樱,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任灵兰)

① 高第《中国书目:关于中华帝国的著作目录词典》(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巴黎1881—1885年版。

② 马军《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汉学的译介篇目初编》,《海外中国学评论》2006年第1辑;马军《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汉学的译介篇目汇编》,《海外中国学评论》2007年第2辑。

③ 吴原元《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析略》,《海外中国学评论》2006年第1辑。